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李商隐七律诗对比研究*

代晓丽, 林 忠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十四行诗和七律诗在韵律和结构上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诗歌体裁。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语义连贯上都呈现出汉语传统的“起承转合”语篇结构模式。卡普兰认为英汉两种语言思维模式影响英汉语篇结构,但从研究结果来看,尽管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思维模式有别,但他们在语篇的语义结构上仍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卡普兰的语篇思维模式说存在一定的缺陷。

[关键词]十四行诗;七律;起承转合;篇章结构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111-05

引言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以其想象绮丽结构严谨著名,其中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更是成为千古绝唱,后人把他的诗作为隐晦朦胧的爱情诗的别称。在英语诗歌发展史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让这种发源于意大利的歌咏体裁得到极大的发展,使其在英国文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这两种诗歌体裁的对比研究,发现它们都有相同的语义结构:起承转合。在以往的篇章对比研究中,一般都是采用翻译对应的语料(黄国文 1987 2003; 胡壮麟 1994 等),但本文则采用语域(register)对应的篇章语料。以期通过不同年代、语域相等的语料分析来证明卡普兰的思维模式说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罗伯特·卡普兰的思维模式说

在英汉对比研究中,中外学者都有一种共识:英汉语言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美国的罗伯特·卡普兰(Kaplan 1966)认为语篇的组织方式具有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反映了人的思维模式(thought pattern)。卡普兰通过对在美的多国学生英语作文分析之后指出:由于受自身不同的文化思维类型(cultural thought pattern)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所写的语篇分别表现出自身文化特点的思维定式。譬如英汉语篇结构的模式:英语通常以一个主题句(topic sentence)开头,

直截了当地点出这一段落的中心思想,然后在以后各句发展这一中心思想。闪语(Semitic language)篇章的发展呈平行型(parallel),因为闪语在篇章组织中往往会采用一系列复杂的平行结构。而东方语中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形(indirect),篇章的主题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加以阐述。罗曼语和俄语中的篇章组织方式有些相似,都是呈曲折型(digressive),因为在这些语言的篇章中,都包含有一些似乎是离题的插曲(参见许余龙 2002/2003)。他认为修辞模式的基础逻辑产生于文化,因而修辞在特定的文化中也会随时别异,不同文化的修辞就更不一样了,修辞的规则理念是特定文化在特定时期的产物。在特定的语言里,他认为思维序列和语法是相关的(Connor 2001, 30)。在对英语写作教学研究领域,卡普兰的这一结论已经得到多项研究成果的证实。但是如果考查其他语料,就会发现这一观点存在过于绝对的倾向。

首先,卡普兰考察的材料在两种语料中不具有普遍性。要考查一种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需要两种语言多种体裁的篇章种类例证,其结果才具有说服力。卡普兰的结果只是建立在学生课堂的命题作文(只是外国人写的英文,没有英语本族语者写的其他语言),是一种控制性的实验所产生的非自

* [收稿日期]2007-05-09

[作者简介]代晓丽(1962-),女,四川合江人,邮电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然语料,得出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比如关于英汉两种语篇结构差异的定论,由于缺乏其他英汉文献的支撑,他的结论说服力不够。而使用其他材料(文学作品)的学者则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存在于共性的前提之下(马秉义 1999,许余龙 2002 等)。

另外,卡普兰认为汉语呈螺旋形思维是受到文言文的影响。这种观点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文言文只是古代中国官方的公文风格。早在 20 世纪初,白话文就取代了八股文体,汉语篇章结构也提倡直接的表达方式(Connor 2001, 38)。王墨希等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大学生用英语写作时所表现的语篇思维模式具有现代英语语篇的结构特点,只有少量的学生作文呈现出卡普兰所说的螺旋形思维模式,更多的是中西混合式(李瑞华编 1997, 420—431)。也有研究者同意卡普兰的观点,他们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让汉语篇章趋于间接的表达方式。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人在写作过程中习惯于用诗歌、典故来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思想(Ron Scollon 2000),指出这是一种出于中国文化传统表示对先贤的尊重。但这只是表达习惯的不同,并不是根本的不同,即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国对比研究中往往强化汉英差异,弱化甚至完全忽略两种语言或思维中的共性。尽管对比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差异并解释差异的根源,我们认为发现共性同样重要。因为自然语言和思维的共性是人类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前提,也是差异存在的前提,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李商隐的无题七律对比研究将说明这一点。

二、十四行诗和七律诗的衔接手段对比

Halliday & Hasan (1976:4)把衔接定义为:当语篇中的某一个成分的解释依赖于另一成分时,便产生了衔接,例如:

- (1) Jack works in a factory.
- (2) His boss likes his hard-working.

在这里,对在(2)句中的 his 的理解要依赖第一句中的 Jack, his 和前面的 Jack 同指一个人。这种衔接就是“照应”。除开照应外,还有替代/省略/连接等语法手段和词汇重复、同义词、反义词、搭配等词汇手段,都可以用来衔接(参见 Halliday & Hasan 1976)。对比研究已经发现英汉衔接手段存在较大差异(连淑能 1994),这一点在我们选择的莎士比亚和李商隐两首相同题材的十四行诗和七律里得到证实。见下表:

序号	十四行诗衔接手段	莎士比亚 Sonnet 97	七律衔接手段	李商隐《无题》
1	主题	How like a winter hath my absence been	主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
2	代词照应词汇搭配	From thee, the pleasure of the fleeting year!	主题类比	东风无力百花残。
3	同义词	What freezings have I felt, what dark days seen!	隐喻上联	春蚕到死丝方尽,
4	重复	What old December's bareness everywhere!	隐喻下联	蜡炬成灰泪始干。
5	连词	And yet this time removed was summer's time,	结果上联	晓镜但愁云鬓改,
6	同义词	The teeming autumn, big with rich increase,	结果下联	夜吟应觉月光寒。
7	同义词	Bearing the wanton burden of the prime,	隐喻理由	蓬山此去无多路,
8	反义词	Like widowed wombs after their lords' decease.	隐喻要求	青鸟殷勤为探看。
9	连词	Yet this abundant issue seemed to me		
10	连词	But hope of orphans and unfathered fruit,		
11	连词	For summer and his pleasures wait on thee,		
12	连词	And, thou away, the very birds are mute;		
13	连词	Or, if they sing, 'tis with so dull a cheer		
14	词汇搭配 so that	That leaves look pale, dreading the winter's near.		

从衔接的定义来看,李商隐的这首七律既没有体现衔接的语法手段也没有词汇手段。然而,根据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语义连贯、逻辑结构非常紧密的语篇。它不是通过显性(overt)的连接手段(cohesive device),而是通过诗中各行的意义单位之间的类比(无力的东风不能挽回争艳的百花与爱人的离别之间的关系)、对仗(春蚕和蜡炬的共有特

质隐喻相思的痛苦)以及因果关系(因为相思的折磨而容颜衰老),使之存在着紧密的语义逻辑。诗人通过几种看似不相干事物的共有属性,采用一语/音(“丝”喻相思)双关的修辞手段表达了与爱人离别的痛苦。读起来它是一个整体,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惆怅与期待。

莎士比亚的 97 号十四行诗则是另一个极端。

原诗的每一行由一个小句体现(realization),几乎每一小句之间都有显性的衔接手段。第二句和第一句之间是人称代词照应连接:my—thee;第三句与第四句通过重复‘what’连接,强调爱人不在身边的感受,其中‘freezings, December’s bareness’等是第一句里‘winter’的下义词。第二小节的第一句采用显性连接词‘And yet’将爱人在身边时的感觉比喻为明艳的夏天和丰硕的秋天,与第一小节的冬天意象形成强烈对比。第三小节每一行都用了一个连接词表示一种千回百转的绵绵情意。第一句用‘yet’将诗人的感知从客观外界转到内在感受。第二句首的‘But’则是强化了爱人离别后现时空虚的主观感觉。第三句用‘For’表示自己空虚的原因是爱人带走了夏日和欢愉这种因果关系。最后一句的‘And’进一步说明爱人离去之后的结果,那些曾经欢唱的鸟儿也噤声了。在第四小节的两行诗句里,诗人用‘Or’连接前面鸟儿的意象,即使他们歌唱,歌声也是那么乏味。最后的一行的‘That’与前一行里的‘so’相连,所出现的‘winter’与整首诗的第一行重复,形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的结构。此外,诗人在各小节之间、小节内还采用了反义词(increase—decrease,)、同义词(absence—bareness, teeming—bearing, rich—abundant)等词汇衔接手段。

通过本节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衔接方面,这两首诗具有明显的差异,十四行诗使用了各种手段的衔接,而七律诗则没有明显(overt)的衔接手段,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本文所分析的语篇中,而且几乎所有的汉英语篇都有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黄国文 2003)。我国对比语言学界和翻译界的学者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汉语重意合(hypotaxis)而英语重形合(parataxis)(见连淑能 1993: 163—173, 萧立明 2001: 53—54)。然而这种意义表现方式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语义结构的不同,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英汉诗歌的这两种体裁有着相同的语义结构,文化差异似乎并不影响人类思维方式存在某些共性。

三、十四行诗和七律诗语义结构对比

英语的篇章语义结构主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为根本。其模式为发端(introduction)、提出问题(problem)、论证(argument)/反证(counterargument)、结尾(epilogue)。强调通过演绎、归纳、推理所获得的指示意义。在这一点上,十四行诗和七律的目的可以说是殊途同

归。十四行诗和七律基本上属于归纳式的思维模式,诗人在通过一番兴比赋之后在最后两句点题。这和学界认同的英语是演绎式的思维,汉语是归纳性的思维相悖。

汉语对于文章格局有三准四法之说。在《文心雕龙》里,刘勰强调行文应当据情理以谋篇布局“篇章户牖,左右相瞰”。他说的文章应该有三部分亚士文体要求一致:“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故能首尾园合,条贯统序。”(王运熙 & 周峰 2000, 293)四法主要指诗歌的谋篇布局原则:“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陈望道先生则将汉语谋篇布局总结为起、承、铺、叙、过、结六法(陈望道 2001: 248)。

然而,汉语篇章结构得到普遍认同的是元朝人杨载概括的“起承转合”模式。从对整体结构的要求来看,英汉语篇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正文的论证说明过程(马秉义,李瑞华编 1997, 453)。汉语和英语思维都强调思维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是建立在语义间的逻辑关系上的。逻辑关系具体表现为词汇与句子的排列顺序,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大小组合、因果关系等。起承转合不仅是汉语独有的篇章语义结构,在英语篇章(散文、诗歌、戏剧、小说)中很容易找到典型的起承转合结构,如林肯(1863)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罗素(1969)的《我为什么而活》。这一点比较符合自然语言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的假设。十四行诗和律诗的区别不在于整体结构,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起承转合概念具体表达方式的选择等方面。详细比较见下表。

这两首诗的主题是爱情诗里的伤离别,用了大量的比喻刻画离别之情。两首诗均在第一句点明主题。七律用“东风、百花、春蚕、蜡炬”等比喻语义双关地通过一种散点铺开的画面方式展开描写。句与句之间在表面上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系,每句都单独描绘了一种物体,是四个并列的、互相呈现的直观物体,将抽象的、无形的情感相思具体化。第五、六句是一个转折,这里诗人由客观外界的拟人描写转向自己的内心感应:在白昼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白发,在夜晚的吟唱感觉到冰冷的月光这两种意象很好的协调起来。最后的“合”和点题仍然是用两个意象“蓬山、青鸟”象征爱人的居所和传递信息的途径,寄托了诗人对爱人书信的期待。

序号	十四行诗结构	莎士比亚 Sonnet 97	七律结构	李商隐无题
1	起	How like a winter hath my absence been	起	相见时难别亦难,
2	承	From thee, the pleasure of the fleeting year!	承	东风无力百花残。
3	承	What freezings have I felt, what dark days seen!	承	春蚕到死丝方尽,
4	承	What old December's bareness everywhere!	承	蜡炬成灰泪始干。
5	承	And yet this time removed was summer's time,	转	晓镜但愁云鬓改,
6	承	The teeming autumn, big with rich increase,	转	夜吟应觉月光寒。
7	承	Bearing the wanton burden of the prime,	合	蓬山此去无多路,
8	承	Like widowed wombs after their lords' decease.	点题	青鸟殷勤为探看。
9	转	Yet this abundant issue seemed to me		
10	转	But hope of orphans and unfathered fruit,		
11	承	For summer and his pleasures wait on thee,		
12	承	And, thou away, the very birds are mute;		
13	合	Or, if they sing, 'tis with so dull a cheer		
14	点题	That leaves look pale, dreading the winter's near.		

97号十四行诗也是在第一小节提出问题,接着也通过冬天的寒冷和荒芜来比喻没有爱人的日子。小句之间紧密相连,叙述流动性很强。与李商隐七律不同的是这里有一种强烈的对比。第一小节的‘冬天’的萧瑟冷酷和第二小节的‘夏天、秋天’的明艳和丰硕象征着爱人离别前后的欢愉和痛苦。第三小节的转折与七律几乎都是一样从客观外界的移情转到诗人独特的内心感受:没有爱人的日子如孤儿的希望和无子之果。最后两句回归主题,即使夏日鸟儿的歌唱也失去了欢愉,让冬天早早来临,与第一句里的冬天相互照应。

由此可见,中英诗人们都乐于创造形式来显示他们的语言能力。我们可以将十四行诗和七律设想为一个场景或是一个故事。它揭示了一种思想、一段经历,故而通常有一个转折点,或是思想的突变。它们主题鲜明、思路曲折多变,并且常常在最后一副对句中点明题意。两种诗歌体裁一般都有四个部分:十四行诗每四句为一小节,最后两句为一小节。七律则是每两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展开一个论点或是堆积事例,揭示主题或主要隐喻;第二小节就第一小节的主题进行展开;第三小节是一个冲突或转折,在十四行诗里往往由“但是”所引导;最后两行总结,诗人在这里给予读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往往是诗人最终想表达的意义。有时前三部分只是提出问题,最后两行给予解答。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李商隐七律对未来有一种强烈的期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则始终有很强的对比性,夏天的明艳和秋天的丰硕与冬天的寒冷与荒芜象征爱人离别前后的欢愉充实、痛苦空虚。

在情感表达方式上,这两首诗的顺序有着惊人

的一致。十四行诗的前八句和七律的前四句一般都是从外部的客观世界开始起题,描述与主题相关事物的共有特性。几乎是在相同的位置在李商隐对镜伤怀的时候,莎士比亚也将话题引向自己(Yet this abundant issue seemed to me)。第三小节开始由客观外界的描写转入诗人的主观感觉,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总之,两首诗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

另外,英汉这两种诗歌体裁都强调转折,而且转折的位置也相同。律诗的“转”一般在第三联,十四行诗的转折点也在第三小节。英文是形合句式,故而转折比较明显,汉语是意合句式,转折点相对模糊,但无一例外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两种诗歌结构中转折都至关重要。其一是转折所形成的对比效果,从对比中获得衬托的美,对比是造成转的结果的重要方式。其二是对读者而言,转折可以让读者在突然的顿挫中获得阅读快感。当诗人表现一个事物时突然停顿或中止下来,转而去述说另一件事,以破坏读者的阅读习惯产生节奏感,使读者获得意外的喜悦。这种顿挫造成思路中断,形成曲折的感觉,在往复中婉转回旋,最大限度地表现诗人的情感深度,淋漓尽致地体现诗歌的语言美。

两首诗除了语义结构几乎对等,由于表达的情感一样,在描写情感词汇的选择上也有较大的相似

性。七律里出现的“无力、残、死、尽、干、愁、云鬓改、寒”几乎可以对应十四行诗中的“decease, barrenness, widowed wombs, unfathered fruits, dull, pale, freezings”等词汇。虽然两首诗语言有别,相隔的年代也久远,其修辞手段却如此接近,说明卡普兰的相关结论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语言选择的一致性也从另一面说明人类在情感感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共性,这种共性也通过语言使用规则表达出来,并不会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变异,因而不同语言所代表的思维模式的共性与差异一样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

徐盛桓(2001)认为,我国现代语言学语篇研究基本上是沿袭的概念范畴,存在着一个中国“缺席”现象。因此很多语篇对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削足适履。本文从中国传统的语篇模式“起承转合”来考察英汉爱情诗语篇的差异,验证了大家普遍接受的卡普兰文化思维模式说的缺陷,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认为英汉对比研究也应该有汉语规则为参照,汉语也是一种发展成熟的语言,值得所有研究者认识、认同、参照。

- [2]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3]胡社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 [4]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 [5]李瑞华编.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6]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 [7]马秉义英. 汉句子结构常式比较[M].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2.
- [8]王运熙,周峰. 文心雕龙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9]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10]Connor, Ulla. 对比修辞——第二语言写作的跨文化层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11]Halliday, M A. & Has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12]Scollon, Ron & Scollon, Suzanne Wong, Andy Kirpatrick, 汉英篇章对比研究[J].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13] Shakespeare. The Poems[Z].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参考文献]

- [1]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朱德东)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William Shakespeare's sonnet and Li Shangyin's seven—syllable—verse

DAI Xiao—li, LIN 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Both sonnet and seven—syllable—verse have strict poetic format in rhythm and structure. Comparative research find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big difference in expressing form between sonnet and seven—syllable—verse, both of them show the textual structure patter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ning, development, change and conclusion" in semantic coherence. Kaplan thinks that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influences textual structur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Howev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lthough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different, there is still big similarity in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discourse, thus, there is a defect in Kaplan's textual thinking pattern theory.

Keywords: sonnet; seven—syllable—verse; opening, development, change and conclusion; textual structure